

■ 南溟奇甸



◀溪北书院新修院墙的大门，匾额仍沿用杨守敬的字迹。 本报记者 陈耿 摄

↓溪北书院匾额。 本报记者 张茂 摄



“書”字少一横，“講”字少一竖 百年书院“错字”藏玄机

■ 何杰华

“文昌溪北书院有两个字是错的！”——在网络上搜索这句话，能查到十数篇言之凿凿的文章，细数溪北书院的匾额上“書”字少一横和讲堂的匾额上“講”字少一竖。百年书院真有两个错别字吗？

是另有深意还是残缺之美？

全国古代书院的山门长得都差不多，上悬书院名匾，旁立对联，溪北书院也不例外。天下第一书院——岳麓书院的山门上高悬宋真宗真迹“岳麓书院”名匾，左右立对联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，满满的是坐拥这座千年书院的湖南人溢于言表的自豪。

海南文昌的这座溪北书院山门上悬的四个字出自杨守敬。杨守敬是著名书法家、金石家、藏书家，一生著述八十多种，被誉为“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”，他的《水经注疏》更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。

溪北书院与杨守敬结缘，源于他与潘存的师生情缘。作为学生，他恭敬地为老师的书院题了名，还在其中与他的老师一起，玩了一个值得玩味的专属于文人的文字游戏。

杨守敬和他的老师潘存一样，都是书法大家，这“溪北书院”四个字，便充分体现了他的汉隶书风，用笔松散，尤以“溪”字的长横为典型。但如果是个细心的人，会发现这匾上的“書”少了一横。

因为杨守敬是书法大家，所以没人会认为是错的，都认为这

里一定有什么故事，有什么玄机。毕竟这样来，顿时就有了古代文人的风雅了。而据笔者比对杨守敬其他书法作品中的“書”字，发现他在书法作品“行仁义事，读圣贤书”中的“書”并没有缺这一横，再找来其他的，也是如此，原来这不是习惯性省略，而是特意为之。

有趣的还不止这，进山门，过内院，中轴线上的第二处建筑便是讲堂，这也是书院里最为重要的部分，是日常老师讲课之所在，跟现在的教室是同种功能。上悬“讲堂”名匾，是潘存亲笔所书。巧合的是，“讲堂”的“講”字同样少了“一竖”。

它也如山门名匾的“書”字样，是刻意为之吗？为此，笔者找来潘存辑、杨守敬编的《楷法溯源》，查看先生所录的“講”字的多种写法，一一比对。

海南出版社付梓的《楷法溯源》上册第213页，共收录了“講”字的四种写法，分别采自《法根师碑》《道因法师碑》《充公碑》以及更多人熟悉的《多宝塔碑》，其

中，《道因法师碑》《多宝塔碑》中的“講”字，没有中间那一竖。然后，找来《道因法师碑》和《多宝塔碑》，查到其中的“講”字。

可见，这个“講”只是看似是个错字，它只是不同于我们常见的写法而已。

缺一横笔的“書”和缺一直笔的“講”字，到底是师生应和还是残缺之美？今天大概难有定论。但后人更愿意认为，这是中国书法史上意义深远的两个残缺字，是潘存及其学生在告诫后人：作为

为师长，毕生有讲不完的学；作为学生，毕生有读不完的书。学海无涯，要刻苦自励，孜孜不倦，由此也可见一代名家潘存的良苦用心。

潘存书法影响深远

潘存先生虽幼时便是神童、奇才，但科举、仕途都不算顺畅，三十四岁才中了广东省的第五十五名，花钱才捐了个六品的户部主事，从其好友李铭的《赠送孺初道友南归序》中的“授六品之官，不禄而能活”这句来判断，还是个不发工资的候补主事，但老先生倒似乎也没因此而生活窘迫，过得也算自在。

为官二十多年里，潘存先生在忙些什么呢？其侄孙潘为渊是这样记录的：“京曹簿宦，公余多暇，益研究经史，淹贯百家，工诗古文词，而为学务求实际。先生性好临池，用笔得古人秘钥，能悬臂作蝇头细楷，凡汉魏六朝碑版，以及唐晋宋明诸名家法帖，藏度最富，朝夕摹写，至废寝食，故所作字，骎骎入古之室，中外争宝贵

之。日本高丽名士，每不惜重价购其片楮。杨惺吾孝廉随使往日本，寄书旋云，东洋人见先生书，仰之如泰山北斗云。尝著《楷法溯源》一书，计七卷，镜六书之渊源，订百氏之讹谬，惺吾孝廉为集贤，刊于武昌，小学家辗转购求，无不家置一部，视同鸿宝。”先生一直忙两件事，研究经史，钻研书法，并辑录一本堪称书法领域扛鼎之作的《楷法溯源》。

《楷法溯源》收集整理了从魏晋到五代的碑帖达700多种，全书按《说文解字》部首序列编排，每一字都举出了古碑古帖的多个例字，如“岁”字便举出了三四十种之多。这当然能练就上文所说的“能悬笔做蝇头小楷”的硬功夫，但这里更需要的是创作者的“克己”精神。做不到严于律己，做不到抵抗诱惑，做不到高度专注，是下不了这苦功夫，出不了这细活的。

潘存的书法成就还体现在对海外的影响力上，日本书坛领袖杉村邦彦在《近代中日书法艺术比较》一书的序中是这样说这份影响的：明治十三年，书法家中林梧竹以一介布衣抱着专门的学习书法的目的渡海去中国，向杨守敬的老师潘存学习汉魏六朝笔法；自此以后，秋山白岩、亚川春洞、下部鸟鸣鹤、宫岛咏士、山本竟山等等，以书法学习为主要目的，相继赴中国留学，揭开了真正的书法交流帷幕。而这来拜师的中林梧竹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书法爱好者，他是日本明治书法三大家之一，是日本书坛极具代表性的

人物。

（作者简介：何杰华，作家，著有《另一面的海南》等。）



溪北书院匾额“讲堂”。

本报记者 陈耿 摄

延伸阅读 溪北书院

溪北书院是我省现存较完整的清代建筑之一，故址位于文昌铺前镇文北中学校园内，建于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。书院由清末著名书法家潘存发起，在雷琼兵备道朱采和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筹资建造。

书院坐北向南，规模宏大，占地6000多平方米，是一所硬山门的四合院型古建筑。书院由大门、讲堂、经正楼、经堂和斋舍五部分组成，全部砖瓦结构，其间由东西廊相连，四周由围墙环绕。书院南开山门，俗称头门，面阔三开间。两边有砖砌的侧间；上为卷棚顶铺盖琉璃瓦，门匾上为清末著名书法家杨守敬所题的“溪北书院”四个大字。

（徐晗溪 编）



杨守敬书法作品“行仁义事，读圣贤书”。 资料图

从《梦华录》看古人市井文化 风靡一时的元杂剧

成熟样态，并为明清时期的戏剧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元杂剧在内容上十分多元丰富，往往以反映民生疾苦为主，演绎出活泼生动的民间生活世界。在结构上，元杂剧表现为“四折一楔子”，《救风尘》就是典型的四折一楔子。

元杂剧的代表作家是关汉卿、白朴、郑光祖、马致远，他们也被称为“元曲四大家”，代表了元代不同流派杂剧的创作成就。元杂剧的代表作品包括《窦娥冤》《倩女离魂》《汉宫秋》《梧桐雨》等。关汉卿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位，他擅长写作悲剧，《窦娥冤》就是他最知名的作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救风尘》恰恰是一个例外，也是关汉卿作品中悲剧性最少的一部。

元杂剧的叙事与文学魅力

元杂剧属于戏曲艺术。作为一种为了舞台表演服务的文学形式，元杂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，它通过将诗歌、音乐、表演、念白相结合，演出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元杂剧往往有丰满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设置，同时也在文辞上下功夫，有着富于音乐性、既优美又通俗的语言文字，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别样魅力。

从现存的剧本可以看出，元杂剧的创作已经趋于成熟，是十分精致的文艺创作。首先，元杂剧在内容上征用了大量在民间流传已久的故事，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，在素材的来源上十分广泛。其次，元杂剧角色被分为旦、末、净、杂，这些角色之间分工明确，并被予以高度象征化和艺术化的表现。最后，元杂剧的文辞

非常优美，继承了唐诗宋词的抒情性，同时又予以通俗化的表现，通过唱和说白结合的方式推进叙事，“曲白相生”之间将作者的情感倾注其中。

例如，《梦华录》的原著关汉卿的《救风尘》中，主要讲述的是赵盼儿救宋引章的故事：汴梁歌姬宋引章被富家子弟周舍所引诱，轻信并嫁给了周舍，婚后遭周舍折磨和殴打。她写信给姐姐赵盼儿求救，赵盼儿施加巧计，以自身为引，从周舍手中骗得休书，成功救出宋引章。

杂剧中的赵盼儿聪慧而机智，体现了女性的智慧和勇气，同时故事的编织围绕着“救”展开，高度集中的情节编织体现了强烈的戏剧张力。而电视剧的改编正是以此情节为引子进行展开，将故事人物和情节扩充，讲述赵盼儿、宋引章和孙三娘这三个平凡女人进东京开茶坊创业的故事。

可以说，《救风尘》的原著为《梦华录》的改编提供了良好的叙事资源和文学基础。

文人融入元杂剧创作

元杂剧的兴盛有其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。一方面，元代是蒙古人主中原后建立的朝代，也是典型的多民族交融往后发展的王朝，上层社会喜欢诸如歌舞戏曲这类的表演形式，且在社会风气上更为开放，这使得戏曲这种平民化和通俗化的艺术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，这是元杂剧发展的社会基础。另一方面，元代经济和商业的繁荣，使得戏剧表演更为社会化和商业化，成为城市民众消遣和娱乐的重要方式，因此城市经济的发

展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。

不过，颇有反讽意味的是，元杂剧的兴盛与元代文人地位的下降相关。元代朝廷并不重视文人的作用，让读书人处在“九儒十丐”的地位，这使得文人的身份和地位下降，他们不再像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一样属于处在社会上层的精英阶层。同时，由于元代一直没有恢复科举制度，这使得大量文人缺少了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上升空间，只能下沉到民间社会中，这使得元代文人与民众的关系异常密切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这些满腹才情的文人沦落都市，与民间艺人相结合，为勾栏瓦肆写作杂剧和唱词等，而他们的有机参与对提升杂剧的艺术品质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于是像关汉卿这样的剧作家脱颖而出。他一方面十分熟悉和了解民间社会和民众生活，能够将素材加工整理为成熟的叙事作品；另一方面又有较高的文学素养，能够将文人的文学才华贯穿到创作中。因此，元杂剧的创作格外兴盛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戏剧发展的高峰。

毫无疑问，像关汉卿《救风尘》这样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名作，不仅是在历史和时间的淘洗中积淀下来的艺术精品，也是中国人巨大的精神财富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，诸如此类的叙事作品还有很多，唐传奇、宋话本、元杂剧、明清小说中精彩的故事比比皆是，展示了中国人独有的情义和伦理，都可以供现代的创作者改编使用。

（作者简介：汪荣，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）

■ 汪荣

电视剧《梦华录》可谓是2022年现象级影视作品。与近些年其他热播剧内容来源不同，该剧并非改编自热门的网络小说，而是改编自元代戏剧名家关汉卿的杂剧《赵盼儿风月救风尘》（简称《救风尘》）。可以说，元代杂剧《救风尘》高超的叙事艺术为《梦华录》奠定了良好的剧作基础。这不禁引起了我们对元剧的兴趣。

元代是杂剧的繁荣期

熟悉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，中国素来有“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”的说法。这个说法指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脉络，也指出了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几大高峰。元曲正是“一代之文学”的代表。

从文学知识上来说，元杂剧和散曲被合称为元曲。杂剧是戏曲，而散曲是诗歌。按照常理来说，两者属于不同的文体，不过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。由于元杂剧的影响太大，所以有人以杂剧来指代元曲。换言之，作为元代文学高峰的元曲就是出自杂剧。元杂剧形成于宋代，但在元代有了突破性的进展，取得了巨大成就。

在中国戏曲史上，元杂剧有承上启下的作用，也是中国戏剧发展的高光时刻，它成为中国戏曲艺术最早

著名的艺术家李斛绘制的关汉卿像。 资料图



■ 史志琼崖

“野鹤”进士黄河清

■ 陈有济

中国古代，“学而优则仕”是大多数读书人的选择。也有一些读书人，才富五车，考取举人、进士以后，却不追求当官，而是安于在家乡从事教育、传播文化，过着悠游的田园生活。清代儋州进士黄河清，就是这样的人，被人称为“野鹤”进士。

黄河清（1721—1803），字浚如，号巽山，儋州徐浦村人，自小聪颖勤奋，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考中举人，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又高

中进士。黄河清中进士后，不追求仕途，“辞不赴选”，安居于家乡。闲暇时，黄河清常牵着小牛犊到溪边喝水，自己则在旁钓鱼，有人劝他入仕，他不为所动，仅指着牛和钓鱼竿对人说：“没空”。黄河清还在屋内挂着一副“笼鸡有米汤锅近，野鹤无粮天地宽”对联以明志，表示不愿出仕为官。

不慕仕途的黄河清，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教育育人之上。黄河清学识丰富，教学有方，桃李满园，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学生。如他的门生吴伍全，“为文精深宏博”，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考中举人；他的另一个弟子黎伟，是贡生，“文以清真为主”，人称最得他的真传。

清代的儋州，虽然有崇文尚教的风气，然而由于地方经济欠发达，人们普遍贫困。黄河清经常周济经济困难的弟子，让他们能够安心读书。除了资助贫困学子，黄河清还与知州吴嘉炎倡议设立“公车基金”，专门资助儋州举人上京考进士。

吴嘉炎是山西泽州进士，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莅任儋州知州。刚到儋州不久，吴嘉炎听闻黄河清的才学和品节，十分嘉许，决定前去拜访。从州城到徐浦，虽不算远，但由于人生地不熟，吴嘉炎颇费周折才寻到黄河清，两人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友谊。

吴嘉炎在儋州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，即儋州学子考中举人的不少，但考中进士者几十年未见一人。经打听，吴嘉炎得知了缘由：儋州百姓经济困难，而“儋州去京师且万里，水陆道路，费非二百金不给”，有的士子考中举人后上京考进士，如果一次考不中，便没钱做盘缠再次应试；而有的贫困士子，即便考中了举人，但一辈子都没能力凑够差旅费上京参加会试。

为了资助举人考进士，吴嘉炎与黄河清、儋州带头捐钱，募集到一些银两作为“公车基金”，选派专人管理，以其孳息赠给参加会试的举人。“公车基金”效果很好，设立后不久，儋州就出现了前后中举的一批举人同赴会试的盛况。

杏坛以外，黄河清也很关心老百姓的疾苦，他曾作《祈雨文书》为民求雨；他与儋州知州余之涣的唱和诗，实为民请命之笔；他还撰文批评儋州的恶风陋俗，提倡移风易俗。

黄河清一生笔耕不辍，涉猎广泛，他的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。如他给同科解元亦同乡的陈圣与写的两封书信，至今仍在儋州、乐东两地传诵。

黄河清德才兼备，有功于地方，历来备受尊崇。光绪八年（1882）中举，被誉为“一州伟望”的儋州举人唐丙章，曾作《拟送黄先生河清入乡贤祠》：“亲乘天语拜彤墀，豸旛光华好羽仪。北固山河称胜概，西京声价重当时。功名未足经生事，品学能邀圣主知。要与乡贤同俎豆，文庄忠介是师资。”诗中对黄河清的品德和才学作出了高度评价。

黄河清的胞弟黄海清、堂弟黄河照亦是举人。黄河照在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中举，黄海清于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由拔贡考中举人。黄海清、黄河照与黄河清一样，“高尚不仕，如出一辙，人称‘三黄’”。



投稿邮箱 wsh_hndaily@qq.com